

学术动态

吴敬琏：中国诸多经济弊病根源在于缺乏思想市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要为中国探寻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就需要研究基本问题，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密切地联系实际，去研究一些基本问题。在一个比较高的理论支撑之下，来提出我们的各种意见，而且能够形成一个接力赛，就是大家的研究成果能够你追我赶，使得我们的认识步步深入，我们的对策也越来越有效。

其实，最近有一些提法是与时俱进的，譬如去年十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提法，就是要“要求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是说国家在领导经济的各种政策，应该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的地位。根据吴敬琏的理解，如果从世界范围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总的趋势是要把产业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但是也许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跟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成果有所脱离、有所忽视，所以对这个重要的决定反应不是很强烈。今年六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建立公平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在新制订的政策和新建立的制度中，先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接着对已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那些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就要进行修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是建立我们市场体系一个很关键性的步骤。这就体现了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国际上研究的成果，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成果接下来贯彻得好，要求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也能够与时俱进，也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能够把我们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建议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问题上能够取得进步呢？就是开拓资本市场。关于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听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讲学的时候，就听到过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就是“自由而切实地讨论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的前提。”因为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

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他 100 岁的时候到北京的财经论坛做了一个视频的讲演。他说，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从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有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就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吴敬琏认为，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努力去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我们才可能有机会看到科斯所指出的这一天的到来。

厉以宁：信息量的组合、信息的组合才是创新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在“大梅沙论坛”就创新问题提出新看法。针对熊·彼特的“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厉以宁认为这在当时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信息化时代后，信息量的组合、信息的组合才是创新。不掌握最新的信息，光是生产要素的重组，那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两厂一合并就能够创新了？要看你的信息量掌握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新的因素在里面。从创新概念来看，中国古语“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观念越来越不灵验。思路要变假定思路不改，你要失败永远失败。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厉以宁认为，创新的主角也在转变，现在的企业家不是创新主体，创意更多来自年轻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是因为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成为了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不对的。今天情况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候大量的年轻的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知识就少，今天大量涌入创新市场，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年轻人都是有知识且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熊·彼特的观点是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然后把发明家的发明移到新的领域去。这

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因为不了解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网络时代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加快了，网络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出来，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有人自动向你投资，不是过去求别人投资。信息化时代主要是“创意、创新、创业”三个连在一起，要使经济能够创新的话必须先有创意，先有创意的人并不是企业家，先有创意的人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咖啡馆，别小看那些俱乐部，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何在，一旦有了创意了，这个时候能够发现机会投资的这就是企业家。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谁也难以预料五十年后，我们的消费模式、投资模式、就业方式如何。那好多东西都在变。失败者跟成功者同样在涌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思维。可以这么说，在未来的时代中，“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不需要企业家，需要的是领头者、领跑人。他一旦新的发现就会出现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这样就行了。所以创新、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现在已不是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谈的情况。

李佐军：企业要制定独特的发展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近日在“2016 商汇年会·新经济高峰论坛”上，就产业升级和企业应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创新型企业就是新主体，尤其是创新型的领军企业，还有创新型的个人以及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新产业包括智能制造业、信息消费产业、电商、还有文化创意等。李佐军表示，企业家最担心的是产业融合问题，比如哪些行业比较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等。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度化，原来发展一产，后来发展二产、三产，非农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经济服务化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度化的过程。产业产品高端化。高端化是产业内部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的过程。因为消费结构升级了，如果不高端化，满足不了消费者新的需求。人才、住房、知识产权、税费、物流等成本不断增加，中国经济悄然进入高成本时代，企业想赚钱有三个选择，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销售价格。但产品销售价格是国内外市场共同

决定的，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提高附加值来消化高成本，没有这样能力就要被淘汰了。产业集群化。要按照产业集群的规律来发展，因为产业集群蕴藏着产业发展的核心秘密。产业集群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学习成本、营销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可以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应等。具体做法是，培育或者引进种子企业，利用行业商会、协会、促进会等组织来发展产业集群，高度重视产业集群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产品品牌化要通过品牌提高附加值、提升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要尽可能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分享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李佐军还认为，中国经济尚未探底，经济结构调整带来阵痛、新旧产业衔接不好、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国际环境复杂化，都会给企业发展带来挑战。所以，他建议企业要有全球意识、抱团意识，在经济尚未探底的时候，抱团求生存、分工协作求发展；有底线意识，要把最坏的情况想好，找准新定位，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要制定独特的发展战略。比如通过创新杀出一条血路，或者采取产品转型升级战略、背靠大树等战略；还可以采取安静冬眠战略，因为在经济不好的时候，瞎干不如不干；也可以采取降低成本战略、重大投资时采取谨慎投资战略，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下，投资要谨慎一点，在经济相对低迷的时候，适当等待也是有好处的。

邹至庄：好的经济学家要经过大师的训练

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近日在“大师讲堂·复旦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认为，经济学者不应有海归和本土之分，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经过大师的训练，而中国目前并没有大师。我觉得每一个人对经济的研究还是由他自己的兴趣来决定。如果我在复旦大学教书，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对某个问题有兴趣，我就让他自由发展。不要有什么领导来指示在中国应当研究问题 ABCD。看谁有兴趣，如果某人对某问题有兴趣，他会影响他的学生，另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问题有兴趣，他也会影响他的学生，这个应该自由发展。关于本土经济学家和海归经济学家的差别，邹至庄认为本土有本土的办法，海归有海归的办

法，不要好像两派的样子，大家都是好朋友，本土也好、海归也好，你的研究是有贡献的，大家都可以讨论。关于学术论文对于经济学者的权重，邹至庄说，在中国需要一个标准，作为院长，很多教授在你系里，谁可以升，谁不可以升，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出来，需要一个答案，需要一个客观的方法。据说在中国期刊有 ABCD，如果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有多少钱。如果不用这个标准的话，是很难的，为什么某某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另外一位助理教授升不上去，院长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方法，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不需要，大家都知道，我一看就知道你好不好。在中国有没有其他的比较公平的办法？我不知道。

李猛：人口城市化的财政代价

李猛在《中国工业经济》第十期撰文认为，“人的城市化”与“物的城市化”重点不同，绩效也不同，后者“事半功倍”，而前者“事倍功半”。城市化是各国公共债务的重要推手，其中财政支出结构发挥了桥梁作用。具体而言，城市化倒逼政府将支出重心从生产率较高的建设性项目转向生产率较低的社会性项目，使得公共部门生产率增速进入下降通道，但公共部门“成本病”日益凸显，财政收支缺口由此形成并不断加剧。在城市空间形态变化过程中，人口从“聚集”向“扩散”的转型将诱发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率运营，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当然，社会性项目在分配财政资金时也有“轻重缓急”之分，那些被压缩的建设性项目资金通常被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以及卫生支出。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财政代价在城市化的不同时期并非一成不变。当城市化率大于 55% 以后，城市化对政府债务的影响系数更大且更显著。究其原因，私人部门生产要素的流向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在城市化中前期，要素主要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部分地掩盖了公共债务问题；在城市化中后期，要素则从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行业，如此，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叠加效应，彻底揭露了公共债务问题。（卫星 / 整理）

国际化需维持人民币平稳，经济短期又导致弱势货币；真实情况是美元“不强”、人民币“不弱”。

人民币阶段贬值即将终结

■ 胡月晓

自 2015 年 8 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新形成机制建立以来，人民币进入了新一轮的持续贬值进程。伴随市场汇率的波动，汇率贬值预期数度潮起潮落。进入 2016 年下半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行为和贬值预期相互增强，人民币贬值预期空前强化，对股市、债市，甚至楼市等其它市场，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不过笔者认为，鉴于人民币管制货币的性质地位未变，以及中国既定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取向，人民币不会持续贬值；综合来看，人民币阶段贬值即将终结，人民币汇率将进入中期(3-6 月)的平衡运行区(6.5、6.8)。

一、人民币并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

人民币贬值预期的理由，是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高资产泡沫和货币超发。国内资产价格高估和货币超发，确实会造成一国货币对外价值的毁损，即贬值。不过，这一条件下贬值的实现，存在一必要前提：资本的自由流动。没有资本项目的开放，一国的资产、资本、货币和国际市场就是隔离的，资产价格的高低和货币发行多少就失去了国际比较的基础。在中国资产项目仍未开放的条件下，国内资产泡沫和货币超发造成贬值的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退一步讲，中国时下的资产价格高估状态是否稳定，是资产泡沫能否成为贬值推力的更关键因素。笔者在另一篇专题《中国资产泡沫的前景》中曾专门阐述：中国资产泡沫主要体现在楼市泡沫。而当前中国楼市泡沫状态是否稳定？单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市场当前给出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暂不去评判市场回答是否准确，回答仅反映了当前市场的主流预期）。至于货币超发，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中国虽然货币超发，按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如美、欧、日、英等国，其货币超发状态，程度恐怕并不亚于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言及中国货币超发的原因时，外汇占款上升造成的被动投放，被认为是中国货币过度升化的重要原因。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外占的上升，深受国际货币环境变化的影响，显然是美、欧、日等国，利用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地位，只管一己私利，不管它国“死活”，疯狂放水的结果。实际上，鉴于通货紧缩的压力，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经济体对超宽松货币政策，一直存在有强烈偏好，并持续应用之。



二、人民币持续贬值已显著偏离国际汇市运行格局

人民币贬值预期因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而起，通常也仅是针对美元而言的。2016 年 1 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回升，人民币贬值预期一度消退；下半年后，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出新高后，贬值预期再度兴起，并随着人民币兑美元的持续贬值走势，不断自我强化。

不过，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对其它货币的汇率变动却保持了相对稳定态势：人民币兑欧元平稳运行在(7.4、7.5)之间，瑞典兑人民币基本运行在(6.8、6.9)之间，加元兑人民币大致运行在(5.05、5.19)之间；即使是在国际汇市上表现相对强势的商品货币澳元和新西兰元，人民币对之汇率也保持了平稳态势，澳元兑人民币平稳运行在(5.0、5.15)之间，新西兰元兑人民币平稳运行在(4.8、4.9)之间。人民币对以上货币的汇率走势都呈现了横盘波动的运行模式。人民币对外价值的下降，主要体现在兑美元和兑日元上。从现象上看，日元的强劲来源于日本央行的货币超级宽松政策，而美元的强劲则来自于美联储的货币收缩(主要是加息预期)。可见，当前人民币贬值预期成因不该来自货币层面，更大可能是源于经济层面因素。比如，美国受“脱欧”影响，源于前景忧虑造成市场主流预期，尽管英国央行也加大了货币宽松力度，但人民币兑英镑仍维持了升势，而英镑对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则全面回落。笔者认为，当前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更多地应来自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从美元的走势看，美元也并非如市场想象中的“强劲”。2016 年以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运行基本平稳；美元兑加元排除 1 月份的异动后也运行平稳；美元兑瑞典的汇率走势，在平稳运行态势中波动区间甚至还收窄；商品货币澳元和新西兰元的美元汇率，上半年还经历了不少的升势，下半年方表现平稳。整体看，国际汇市上美元的强势，仅表现在英镑

上，对日元还表现了持续贬值态势，下半年后方有所企稳。

综合来看，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多汇市的整体表现都是偏向稳定的，都没有出现整体性的单边变化态势，但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却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人民币兑美元持续贬值！从整个国际汇市看，美元没那么强，人民币也没那么弱。

三、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是中美政经博弈结果

现阶段人民币仍然是管制货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保证了管制引导、干预的有效性。笔者深信，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平衡、双向、有序、可控”政策目标，是一定能够得到实现的。

历史上看，人民币曾多次“钉住”美元。长期以来，出于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美国惯常指责中国人民币“低估”。中国则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的，一直“顺从”地让人民币对美元缓慢升值。人民币成功进入 SDR 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目标已经实现，进一步国际化进展对制度安排的依赖度下降，转而更多地依靠市场主体的实际接受度提高。而要让海外市场认可、接受并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的自由化就不可避免。当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管制放松时，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态势延续和中国出口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压力就应时而起，接受适度贬值成为中国政府顺应市场的现实选择。

与经济上既合作又竞争的态势不同，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在区域政治交往中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挤压”政策：政治上制造中国周边环境国家的分歧“热点”，政治上压制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华尔街主导的海外金融机构表现出了团结、一致地高度敏感性，频频做空人民币，并不遗余力地制造人民币贬值预期。

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取向需要维持人民币平稳甚至升值态势，但短期选择目标又使“弱势货币”成为当前的更现实选择。当贬值预期的经济负面效应和政治负面效应，积累到影响当期经济运行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时，人民币管制力度的加强就会反弹。既然，国际汇市的真实情况是美元“不强”、人民币“不弱”，那么人民币兑美元的阶段贬值目标，就可能随时结束，当前这一终结时点已为时不远了。



研究表明,长时间工作会导致疲劳,让人更容易出错,结果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去清理烂摊子。

加班文化适得其反

■ 赫弗南

当工程师谈到“资产完整性”的时候，他们通常指的是在设备损坏前维护和修理设备的良好做法。使用大量机器的企业非常重视这一点；而主要只使用人力的公司则鲜少重视此事。

尽管据我所知，除日本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有专门指代工作过度劳累所致死亡的话语——“Karoshi”(过劳死)，我们很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词。因为尽管人们很容易以为这种现象是日本独有的，实情可能是日本是第一个看得足够深入从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国家。这个在上世纪 70 年代发明的词语上个月重现于日本报端，东京劳动局(Tokyo Labour bureau)裁定，广告公司电通(Dentsu)的年轻雇员 Matsuri Takahashi 自杀是因工作过度劳累导致。她生前曾在一个月里加班了 105 个小时。

我认为的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主要是在美国和英国——通常每天工作 12 或者 15 个小时，每周工作 6 天或者 7 天。其中很少有人熟悉通常表明工作效率并非线性的研究。在一周工作约 40 个小时以后，人就会开始感到疲劳，修正出错，然后又需要花时间来收拾烂摊子；导致性能下降，平复愤怒的情绪——到头来是白忙活一场。有关这一点，效率专家弗兰克·吉尔布雷思(Frank Gilbreth)有一个经典又好笑的描述。他发现如果他同时使用两片刀片刮胡子，刮得会更快，但之后他不得不把节省出来的全部时间，浪费在用创口贴处理刀片留下的小伤口上。

尽管有少数首席执行官喜欢吹嘘自己的忍耐力，很多首席官都坚称，他们的岗位就是需要长时间工作。他们承认，这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有少数首席执行官已经学会把在周末拟好的电子邮件储存在发件箱里。但 2013 年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工作的 那名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实习生的死，

如此快地被理解为过劳死，表明每个人都完全清楚，经济危机和好工作的相对稀缺正在摧残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

这与英国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尔莫教授对 1 万名白厅公务员进行的纵向研究的发现一致：压力似乎集中于金字塔的顶端和底层。但当玛丽安娜·弗塔嫩继续研究这种压力的长期后果时，她发现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或者更久，会使人出现“重度抑郁期”的风险加倍。一辈子长时间工作也与中年时期认知能力下降(推理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创造力都出现退化)存在相关性。

这些损害都是看不见的。如果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一些损害会导致可见的伤害，也许企业会更加注意。但大多数人很难接受这一观点，即思维活动是由大脑完成的一种生理活动，而大脑，就像每一个器官一样，它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我们可以看到机械损坏，我们可以注意到断胳膊断腿。我们看不到破碎的心灵——直到已经为时太晚。正念、韧性训练等人们以为可以消除过劳的项目的流行，或许能带来一些暂时的缓解，但项目目标很少称得上治本的对策。这些项目在提高人的忍耐力、反而会让问题持续得更久。我们知道机器有极限；但我们却喜欢想象我们自身没有极限。

靠工作时间来衡量员工表现的严酷企业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疲劳和视野狭窄，不利于解决问题。从减少成本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有效的，但在声誉和判断很重要的领域，这样的企业文化很危险。如果我们想要创造性、原创性以及掌握复杂问题，我们必须接受人脑存在生理极限。如果我们无视 100 多年来对人类工作效率的研究，把人当做配备着有缺陷的电池的机器人一样去管理，我们就浪费了人的才能，牺牲了我们自身的健康。